



近代中国的 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s in
Modern China

刘文楠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近代中国的 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s in
Modern China

刘文楠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刘文楠著.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5. 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7229 - 4

I. ①近… II. ①刘… III. ①抵货运动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①K25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014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著 者 / 刘文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宋荣欣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229 - 4

定 价 / 6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内容提要

吸烟能让人上瘾，处于娱乐消遣和吸毒成瘾的中间地带。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曾有过多次规模不一的不吸纸烟运动，但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本书从史料中钩沉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团体和政府发起的数次不吸纸烟运动，考察其宣传话语、组织实践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思考在尚无确凿证据证明吸纸烟有害健康的情况下，不吸纸烟运动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以及在无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不吸纸烟运动的推行机制。

本书首先讨论美国传教士丁义华如何将美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移植到中国的语境中，并于 1910 年在天津发起了一场类似的不吸纸烟运动。在此次运动中，源于英美的基督教节制观念和强健国民身体的社会达尔文思想，与晚清中国的宪政改良思想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中西观念交流的双向互动。其次，探讨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不吸纸烟运动。这一运动由曾任清廷官员的伍廷芳联合上海地方名流发起，依托于上海更为成熟的地方名流社交网络和公共舆论，相较于传教士发起的类似运动，有着更为深广的影响力。运动发起者有意识地将“吸纸烟有害”这一外来观念与底层民众的知识结构相结合，并掺入爱国观念和公民意识，表现出新兴“中间阶层”教化民众的意图。继而，本书深入分析了 1934 ~ 1935 年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之劝戒纸烟运动。一方面，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考察新生活运动的顶层设计中不吸纸烟的具体训令，分析吸纸烟的个人习惯如何与道德、节约和公共礼节联系在一起，以及该训令如何在各地实施推行。而纸烟统税收入是中央政府财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不吸纸烟的训令同时又遭到了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另一方面，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观察

浙江的省县政府如何将地方政府保护农村经济的自发愿望与中央劝戒纸烟的训令结合起来，并在县一级积极组织不吸纸烟运动，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和互动，以及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的能动性。

这三次主要的不吸纸烟运动分别发生在清末宪政改革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既表现了一定的共性，又反映了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的差异。尽管当时的西方医学知识在不吸纸烟运动的舆论话语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不吸纸烟运动却常常植根于一些政治化的主题，例如培养合格的国民、拯救国家和地方经济、建立新的公共秩序等等。通过将个人的吸烟行为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政治化的不吸纸烟运动便可以正当地以国家的名义来塑造个人的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运动缺乏可靠的社会机制和社会资源的支持，社会群体和政府又缺乏有效的合作，不吸纸烟运动在组织和落实的过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本书试图揭示，在不吸纸烟运动中，吸烟这一貌似微不足道的个人嗜好如何与国家民族等宏大政治命题联系在一起，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和公民观念的形塑，以及在近代国家和社会中，个人生活习惯受到管控干预的权力机制。这一历史研究也将对今日中国控烟运动有借鉴作用，并有助于控烟宣传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推行。

目 录

绪 论	001
一 不吸纸烟运动能告诉我们什么？	001
二 既往研究中的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	009
三 中国烟草史中的纸烟	012
四 本书概览	021
第一章 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缘起	024
一 吸烟有害论在英美的兴起	026
二 西方反纸烟言论传入中国	032
三 来自美国的福音派改革者：万国改良会和丁义华	037
四 立宪国民不吸烟：丁义华的劝戒纸烟言论	043
五 改良风俗的共同努力	058
六 日常生活的理由：妇女的戒吸纸烟言论	063
第二章 城市社会精英和辛亥前后上海的不吸纸烟运动	069
一 伍廷芳和慎食卫生会	072
二 另类的“卫生”：从慎食卫生会到劝戒纸烟会	076
三 劝戒纸烟会的社会资源	082
四 本土化的反纸烟言论	089
五 革命时的淡出和革命后的持续影响	104

第三章 新生活运动中的纸烟与国家	111
一 以身作则：蒋介石和不吸纸烟运动.....	115
二 吸纸烟的“三宗罪”.....	119
三 规训吸烟行为与国家权力的界限.....	131
四 无心无力：纸烟相关的国家政策.....	139
五 德国与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比较.....	145
第四章 地方实践的变异：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	152
一 浙江的吸烟和禁烟.....	153
二 浙江不吸纸烟运动面面观.....	161
三 利益博弈：海门和温州的抵制洋烟.....	173
四 难以控制的民众动员：临安的不吸纸烟运动.....	181
结语 不吸纸烟运动的弦外之音	195
一 被定义为“恶习”的吸烟行为.....	196
二 不吸纸烟运动的派生性.....	199
三 非正式社会控制的两种模式：社会发起和政府发起.....	201
四 今日中国烟草控制的挑战.....	204
附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纸烟业	212
参考文献	234
索引	246
后 记	252

Contents

Introduction / 001

- I. What Can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s Tell Us? / 001
- II.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s in Modern China / 009
- III. Cigarettes in the History of Smoking in China / 012
- IV. Outline of the Book / 021

Chapter On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the Origin of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s in China, 1910 / 024

- I. The Rise of the Anti-smoking Rhetoric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026
- II. The Western Anti-smoking Rhetoric Introduced into China / 032
- III. The Evangelical Social Reform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 037
- IV. Citizens in a Constitutional State Should Not Smoke / 043
- V. The Joint Efforts to Reform the Customs / 058
- VI. Quitting Smoking for Reasons in Everyday Life / 063

Chapter Two The Urban Social Elite and the Voluntary Anti-cigarette Campaign in Shanghai, 1911 / 069

- I. Wu Tingfang and the Society of Rational Diet and Hygiene / 072
- II. The Alternative “Hygiene” / 076
- III. The Social Resources of the Anti-cigarette Society / 082
- IV. Ingigenization of the Anti-cigarette Rhetoric / 089

- V. Fade-out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Persisting
Influence after the Revolution / 104

Chapter Three Cigarettes and the State in the New Life Movement, 1934 – 1935 / 111

- I. Chiang Kai-shek and the Anti-smoking Campaign / 115
- II. Three Evils of Cigarette Smoking / 119
- III. Discipling Cigarette Smoking and the Boundary of State Power / 131
- IV. State Policy Regarding Cigarettes during the New Life Movement / 139
- V. Germany and China: a Comparison of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 / 145

Chapter Four Anti-cigarette Campaign in Zhejiang: Local Implementation and Variations, 1934 – 1935 / 152

- I. Smoking and Anti-smoking in Zhejiang / 153
- II.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 in Zhejiang / 161
- III. Game of Interests: the Boycotts in Haimen and Wenzhou / 173
- IV. Mobilization out of Control: the Case of Lin'an / 181

Conclusion / 195

- I. Cigarette Smoking Defined as a Social Evil / 196
- II. The Anti-cigarette Campaigns as Secondary Social Movements / 199
- III. Two Modes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Society Initiated
and Government Initiated / 201
- IV. The Past Experience and the Current Challenge / 204

Appendix The Cigarette Industry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Distri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212

Bibliography / 234

Index / 246

Postscript / 252

绪 论

吸烟有害健康现在已是为人普遍接受的常识,烟草控制在今日中国也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国家制定了控烟政策和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规定,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和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参与组织控制烟草的社会运动。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当纸烟刚刚传入中国不久,就曾出现过数次规模不小的不吸纸烟运动。那个时候,科学研究尚未获得确凿证据证明吸烟有害健康,那么不吸纸烟运动为何、如何能将吸纸烟的行为斥为一种既有害于吸烟者自身又有害于国家民族整体的恶习?吸烟有害的观念,又是如何与其他更宏大的政治社会思潮和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而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让我们回到一百年前,一起来追溯不吸纸烟运动的缘起,重返久已被人遗忘的过去,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历史和当下的理解。

一 不吸纸烟运动能告诉我们什么?

中国人吸烟的历史长达三百多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习惯是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产物。哥伦布把烟草从美洲带到了欧洲,并经由欧亚航路传到了中国,吸烟习惯迅速遍及全国各地,烟草种植和生产也都本土化了。纸烟从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兴起,并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风靡全球,直到19世纪末才从外国引进中国。这种新的吸烟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种现代烟草制品,纸烟口感醇厚,便于携带,象征着时髦、西化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大量中国人改吸纸烟。作为一种利润丰厚的商品,纸烟

促使资本家采用层出不穷的广告和营销策略，扩大销售量。甚至对于政府而言，纸烟也至关重要，因为纸烟税是政府收入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纸烟虽微不足道，却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因为纸烟与各种社会因素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吸纸烟运动才能从细微处折射出近代中国的各种权力机制。

反对吸纸烟的零星言论和行动早在 1899 年就已在中国出现。1898 年戊戌变法后，保守的清廷官员试图阻止西化的潮流，因此他们将纸烟作为一种西化的标志加以反对。比如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载澜，他每天在大街上巡逻，只要看到有人吸纸烟，就会上前把那些人手中的纸烟扔掉。^①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之后，终于采纳了西化和现代化的政策，仅仅因为纸烟来自西方就反对吸纸烟的观点，同载澜那样的极端保守派一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1908 年，御史李灼华奏请禁吸纸烟，当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衡就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评论此事道：“近来台谏颇觉黯然无色，往往撙拾细故上陈”。^②

另一方面，以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为基础而反对吸纸烟的言论也在 19、20 世纪之交进入了中国。有关吸烟如何危害健康的文章开始出现在各类新式报纸期刊上。1899 年 1 月 8 日的《申报》引用了香港《循环日报》的报道，介绍挪威某医生的研究证明烟草不利未成年人的健康，因此挪威新订法律禁止未成年人吸烟，并提到英国科学家发现种植烟草会损害土地质量，因此已经不在英国国内种烟。这篇文章可能是中文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引用西方知识讨论烟草之害的文章。^③此文刊出后第二天，《申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除了重申烟草对人体之害外，更专门提到吸进口的雪茄和纸烟会引起现金外流，损害中国经济。^④此后，反对吸烟的文章也偶

① 《整饬风俗》，《中外日报》1899 年 8 月 13 日，第 3 版。该报道称：“右翼澜公每日巡行街道，遇有高领者必褫之，窄袖者必剪之，吸卷烟者必夺之”，可见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极端保守的载澜看来，都是改移风俗的重要风向标，而卷烟也是他所反感的西化生活的一部分。

② 《巢云簪日记摘抄》，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许宝衡先生文稿》，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第 197 页。

③ 《痛陈烟害》，《申报》1899 年 1 月 8 日，第 2 版。

④ 《阅昨日本报所录痛陈烟害事试引申之》，《申报》1899 年 1 月 9 日，第 1 版。

见于各类报刊和出版物中。^① 这些文章斥责吸烟行为时大多提及西方科学知识, 可谓近代中国不吸纸烟运动的滥觞, 但几篇零星讨论吸烟危害的文章还没有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不吸纸烟运动。

“运动”是个外来词, 在民国时常被用于指称有一定纲领和组织、影响范围较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 如“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国货运动”等, 有时也指针对某一群体的组织和动员, 如“劳工运动”、“农民运动”等。进入共和国时期, 层出不穷、深入民间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动员, 使“运动”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 更紧密地与政治和国家权威相联系。然而, 在英语的语境中, “运动”(movement)一词的含义相当宽泛, 并不必然与政治相关。在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中, “movement”的定义之一是“一群人致力于共同的目标, 为此而做的一系列行动和努力; 一群人致力于推进他们都认同的政治、社会或艺术观念而结成的组织或联合体”。^② 从这一定义来看, 构成“运动”的关键在于有“一群人”和他们“都认同的观念”, 以及他们共同的行动或组织, 而对运动的规模并没有特别限定。英语中的“campaign”一词也可译为“运动”,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campaign”的定义是: “适用于任何与一场战役相类似的行动过程, 这一行动过程或具有明确的时间长度, 或具有战斗的性质, 或有组织地试图达成某个目标”, 可见“campaign”一词虽然像“movement”一样强调运动的“目标”和“有组织”, 但更体现运动的时段性和斗争性。^③ 回到“movement”和“campaign”的英语释义, 使我们可以免受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运动”一词定义越来越

① 例如, 任独引英国医学界观点而成的《戒纸烟说》, 《通学报》1908年5月1日, 转引自冈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第545页。另有介绍烟草化学性质和对人体生理影响的《烟叶篇》, 《大公报》1908年12月2日, 第2张第4版。

② 牛津英语在线词典, <http://www.oed.com>, 最后访问日期: 2015年1月10日。“movement”的第8个定义, 英语定义原文为: “A course or series of actions and endeavours on the part of a group of people working towards a shared goal; an organization, coalition, or alliance of people working to advance a shared political, social, or artistic objective”。

③ 牛津英语在线词典, <http://www.oed.com>, 最后访问日期: 2015年1月10日。这里引用的是“campaign”作为名词的第5个定义, 英语原文是: “Applied to any course of action analogous to a military campaign, either in having a distinct period of activity, or in being of the nature of a struggle, or of an organized attempt aiming at a definite result”。

窄的影响，以一种更宽泛的定义来理解近代中国出现的一系列有组织的反对吸纸烟的行动。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不吸纸烟运动”：一群人以反对吸纸烟为目标形成一个组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展开密集的公共讨论和宣传，以制止自己和他人吸纸烟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虽然阐述纸烟之害的言论时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也经常有人撰文反对吸纸烟，但近代中国称得上不吸纸烟运动的却并不多。

近代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文献最丰富，也最具代表性的，共有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第一次不吸纸烟运动由美国新教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Thwing）于1910年在天津发起。第二次不吸纸烟运动则由曾经担任过刑部侍郎和驻外使节的伍廷芳于1911年在上海发起。最后一次不吸纸烟运动是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并获得浙江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在当地蓬勃开展。这几次运动分别体现了由外国传教士、中国进步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员所领导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宣传和动员方式。除此之外，本书也试图去理解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所处历史时刻的社会政治环境，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从而揭示不吸纸烟运动与政治动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几次不吸纸烟运动的规模都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就效果而言，也并未有效遏制纸烟消费不断上升的势头。但这些不吸纸烟运动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而言，有着独特的重要意义。烟草是一种能刺激神经的物质，能使人上瘾并有害健康，因此吸烟是介于喝茶、喝咖啡等娱乐消遣和吸毒成瘾之间的灰色地带。^① 作为具有明显西方色彩的工业化产品，纸烟被引入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烟草难以定义的处境进一步复杂：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时候，纸烟被认为是外国公司蓄意毒害中国人、攫取中国财富的毒药；在追求产业和生活的现代化时，则又成为国家富强、民众生活改善的指标。因此，纸烟的社会形象往往取决于各种人对它的不同

① 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在其研究成瘾品和神经刺激物如何在全球流通和使用的历史著作中，指出烟草和酒精、咖啡一样，是在生产和分配上受到一定限制的合法瘾品，尽管纸烟对于人体的危害已经得到科学的证实并广为人知。David T. Courtwright, *Forces of Habit: Drug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19.

同理解，受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影响。不吸纸烟运动有意识地将吸烟行为建构为一种有害国家、民族、社会的恶习，将这种看法广为散播，并组织各种劝导人们戒吸纸烟的活动，正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使我们近距离观察到文化建构如何形塑社会行为、动员群众参与社会和政治行动。

在近代中国，中央政府从未对纸烟下过正式的禁令，只有晚清的学部曾经在光绪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1907 和 1908）下令京城和各省的中小学堂学生不得吸食烟草，^① 这项针对学生的禁令虽然被后来的民国所继承，但实行的情况很不理想。而对于成年人而言，吸烟完全是合法的。换言之，不吸纸烟运动无法通过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力量，制约人们吸纸烟的行为。因此，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正式社会控制”，也即使用宣传言论、大众媒体、教育以及社会团体的自我约束等社会力量，使社会规范在人群中内化，让人们自觉戒吸纸烟、相互督促规劝，最终形成反对吸烟的社会风气。^② 正是因为“吸纸烟乃恶习”的观念并非尽人皆知的常识，也没有法律为其背书，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才能生动地展现在清末至民国社会规范急遽变迁的过程中，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运作机制，告诉我们新的社会规范如何建立在科学知识或其他近代观念基础上，如何通过新的公共空间中各种工具和渠道在人群中传播，又如何被整合入为民族国家培养合格公民的社会改良工程之中。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近代中国通过建构各种话语和社会规范而形成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新文化史方法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以话语和象征为研究对象，意图从中寻绎出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例如，在《制造中国》（*China Made*）一书中，葛凯（Karl Gerth）对 20 世纪上半叶国货运动的研究就展示了抵制洋货的行动、国货广告和国货展览会如何形塑了国家的消费文化，并影响了人们的消费取向。葛凯认为，国货运动并没有使人们完全放弃购买外国商品，但它却建构了“国民消费

① 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宣统元年（1909）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96 辑，文海出版社，1985 年影印版，第 333、441 页。

② 关于“非正式社会控制”，参阅〔美〕詹姆斯·克里斯（James J. Chriss）《社会控制》，纳雪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第 35～53 页。

的一般原则，尽管并不是个人消费的原则”，而这种“一般原则”的存在对近代中国国家观念和公民观念的形成却是至关重要的。^①葛凯在此书中对国货展览会的盛况的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如何通过精心安排展会空间和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而非通过使用强制的力量，来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可谓对“小事件”做新文化史式的象征和话语分析的典型例子。

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的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以20世纪初半殖民地的天津为背景，考察中国人如何逐渐将“卫生”一词理解为西方近代公共卫生意义上的“卫生的现代性”，而观念改变的过程又是如何紧密地与城市公共卫生制度和实践的改变联系在一起。她的研究指出，现代卫生观念的兴起，在义和团运动后，使外国殖民者对天津公共卫生的管理更顺畅地推行，并促使中国那些赞成改革的进步精英主动与外国殖民者合作，并积极采纳现代公共卫生的实践。罗芙芸总结道：“卫生包含了福柯的‘生命权力’（biopower）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这两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东西，前者指的是一套技术，通过这套技术，国家可以对生命进行管理；后者指的则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个体在内化了各种规训之后，他们的行为就会与国家的目标相协调。”^②福柯的“生命权力”和“治理术”这两个概念为罗芙芸讨论公共卫生的观念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过程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罗芙芸的研究，我们对知识（也包括某些精心编造、令人信以为真的观念）以及基于知识的习俗和观念所具有的力量，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形塑能力，绝不亚于制度化的监督和管理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

非正式社会控制又与正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主编的《鸦片管治》（*Opium Regimes*）一书将“regime”（这个词有“政权、体制、管理制度”等多重含义，此处译为“管治”是希望表现这些对鸦片的管治体系中既

①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56–357.

②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300.

包括政府组织又有非政府组织的丰富内涵)这一核心概念用于研究近代中国、英国和日本如何管理和控制东亚地区的鸦片消费、生产和贸易,颇具启发性。卜正民和若林正认为,“regime”一词不仅指国家政权,也可以指一些正式的跨国组织(如国联)、带有政治影响力的经济组织(如东印度公司),或是中国国民禁烟会之类的民间组织。他们将这些不同性质的团体置于“regime”的概念下,是为了强调这些组织在控制和干预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的治理能力。因为鸦片本身的特殊性质已经超越了普通商品的范畴,在控制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都需要有强制性权力介入,而权力的介入又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鸦片具有多重性质和身份,既可以是治病的药品、提供快感的瘾品、有助于社交的消遣品,也可以是利润丰厚的商品、祸国殃民的毒品,因此,对广义的“鸦片管治”作一个整体性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从狭隘的道德评判中解放出来,深入研究鸦片在不同权力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在控制鸦片生产、贸易和消费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①

在某种程度上,纸烟和鸦片有共通之处。纸烟从传入中国后不久就被比作“第二鸦片”,因其浪费金钱、败坏身体而受到批评,又往往与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相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纸烟统税制度的确立更进一步将这一产业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新生活运动时期的不吸纸烟运动也不免用到政府部门的强制力。因此,在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时,也可以借鉴《鸦片管治》的编者和作者们的思路,一方面梳理出纸烟的各种社会形象和功能,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纸烟生产、贸易和消费过程的整体性,一分一合两种研究思路相结合,尤其强调在话语构建后隐含的政治维度和权力关系,从而观察到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民族之间关系重组的种种结构性命题。

如果说《鸦片管治》强调的是宏观层面上对“物”的治理,那么西敏司(Sidney W. Mintz)的人类学研究则更强调日常生活中物与人的关

^①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